

李鸿章掌管的政务

近纲 ppt

林海轩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

1 雇佣外军镇压农民起义

2 洋务运动

3 外交

淮军抵沪后，曾国藩谆谆告诫李鸿章对待侵略者要恪守“忠信笃敬”信条。李鸿章又看到外国军队拥有新式枪炮，叹为“神技”，“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他一面以重金聘请洋教官到各营教习；一面向侵略者购买新式武器。此外，他还“全神笼络”华尔，企图通过他向外国聘请“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并以他“一人之心”去“联络各国之好”。

为了认真训练淮军，并与外国侵略者协同作战，李鸿章与何伯以及英国陆军提督士迪佛立订立会商攻打太平军协议，规定：(1) 李鸿章派出淮军 6000 人与侵略军“共维大局”，其中 3000 人进驻南桥，3000 人由英国军官负责严加训练；(2) 作战中夺取的军需品应归淮军所有；(3) 双方军事调动必须互相通知，并互相供给军事情报。这样，李鸿章与资本主义侵略者正式建立了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军事合作。

同治二年（1863）春，李鸿章与士迪佛立订立《会同管带常胜军条约十六款》，议明：(1) 全军编制 3000 人，暂以奥伦为统领，清军以副将李恒嵩会同管带；(2) 常胜军及统带官由抚台（李鸿章）指挥；(3) 军费开支由海关收入供应，军火由李鸿章购买拨给。常胜军整顿后不久，戈登取代奥伦为统领，李鸿章很快“成为戈登的好友和赞助他的人”。

常胜军整顿后，的确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同治二年三月（1863年5月），太仓陷落，太平军被“追斩殆尽”，李鸿章赞扬戈登“坚忍镇定”。不久，昆山失守，太平军7000余人被俘，3万人遭杀害，李鸿章对戈登的“奋勇”表示“殊堪嘉尚”。十月（12月），苏州被攻占，李鸿章率军大肆抢劫财物，并发给常胜军7万元，后奉旨另犒赏戈登银1万两，以资鼓励。次年四月，攻陷常州，常胜军宣告解散，留洋枪队300人、炮队600人并入淮军。攻陷苏、常后，清军加紧进攻天京。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陷天京。李鸿章又调派淮军追杀太平军余部。由于平定“粤寇”有功，清廷赐封李鸿章“一等肃毅伯”。他的淮军由原来的6000余人逐渐扩充到六七万人，逐步取代湘军成为清廷所倚重的一支凶恶军队。在劫掠人民财富方面，李鸿章也并不比曾国藩兄弟逊色，李家兄弟数人在绞杀太平军期间，就兼并土地约60万亩。太平天国起义被扼杀后，清廷集中兵力围剿捻军。同治五年（1866）秋，李鸿章吸取了曾国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扑灭“倏忽无定”的捻军，必须增添马队，马步配合，左右夹击，前后堵截，才能扭转尾随追逐，劳而无功的局面。在战略上，他坚守曾国藩“画河圈地”的主张，实行“扼地兜剿”，驱逐捻军到“山深水复之处”，重重围困，加以歼灭。与此同时，还“阴招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同治六年十二月（1868年1月），赖文光被俘就义，东捻军为李鸿章所扑灭。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2月），西捻军进入直隶，“京师地震”，清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进行镇压。七月（8月），西捻军进入山东境内黄河

1860 年《北京条约》之后，列强暂停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转向大力开拓对华贸易。中外贸易额，由四五十年代的每年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迅速上升到 1864 年的 1.05 亿两。中国很快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了，欧洲到中国的航线大为缩短，更多的西洋商品涌入中国。随大量西方工业品而来的新一轮“西学东渐”浪潮，促使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发生渐进的质变。

1870 年，大清帝国的京畿重地天津，爆发了一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法国领事丰大业（M. Fontanier）枪击中国民众，愤怒的人群将其打死，并焚烧了法国天主教堂。法国联合英、美、德、意等六国调集军舰到天津、烟台，要求清廷严惩“肇事者”。当局把两江总督曾国藩从南京调去平息事端。曾深感“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致”，“……此次天津之案……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于是，他以 16 个中国人头落地换取西方七国息怒。这件事情使曾国藩受到国内广泛抨击，甚至被骂为“卖国贼”，他自己也深感内疚。清廷随即将其调离京畿，转回两江总督。1872 年初，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便在郁闷中病逝。

曾国藩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位，是由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接任的。李鸿章（1823~1901 年，字少荃）是安徽庐县（今合肥）人，也是从曾国藩的幕僚中锻炼出来的封疆大吏。

从 1861 年美国在华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开始，航行于中国沿海及内河的各国商船逐渐增多。在一些河段，甚至 90% 以上的航运被外商控制。机动船严重冲击旧式航运业，中国船户纷纷破产，并且“洋船往来长

招商局收购了旗昌公司后，英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清廷认为与洋船竞争“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加大对船局的扶助：官方贷款“分年还本，缓缴利息”；“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苏浙海运漕米必须照四、五成一律加拨，不准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在降价竞争中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公司，见无法压垮招商局，不得不在1878年与之达成妥协，签订了“齐价合同”。

1882年前后和1890年，怡和、太古公司又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价格抢客户，使得招商局“股价日跌”、赢利锐减。招商局“请将采运局平糶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御之”，使得疲惫不堪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协，分别于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

对旗昌公司的兼并和几次“齐价合同”，在当时被认为是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洋务派和大清帝国的重大胜利，一些洋人也大加奉承。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赴烟台时碰到法俄公使，他们都“称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任事诸人，措置亦甚得当。则此局之设，争利者深忌之，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服也”。

1877年，李鸿章还在天津筹建了开平矿务局。该局早期招股不顺利，股本主要是直接的政府投资和轮船招商局的投资。出煤之后，李鸿章

1878 年，李鸿章还筹建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天津商界名人杨宗濂兄弟的经营下，该局 1891 年“每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

此外，这个时期著名的洋务企业还有几个，大部分为李鸿章集团所主导创办。

1880 年，左宗棠在兰州创建机器织呢厂，主要生产军用布料。

1880 年 10 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由盛宣怀负责的电报总局和学堂。

1882 年 4 月改为官督商办。到甲午战争前，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上下游甚至陕甘的主要城市和国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

1881 年，李鸿章奏请开办承德平泉州铜矿制造子弹。

1887 年，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镛筹建了漠河金矿。【李鸿章创办了不少近现代企业，这方面功不可没。】

1889 年，张之洞在广州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后迁往武汉，更名汉阳铁厂。该厂于甲午战争之前投产，主要生产新式枪炮和铁轨。

1890 年至 1893 年，张之洞先后筹建了湖北织布局、纺纱厂、缫丝局。

此外，还有贵州青铁矿、山东淄川铅矿、云南铜矿、基隆煤矿等等。

在以上企业之外，晚期洋务运动还继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 年的上海方言馆、1866 年的福州船政学堂等学堂之后，创设了一系列西学学堂：1880 年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5 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 年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 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 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2 年的湖北铁政局附属化学堂、矿学堂，1893 年的天津医学堂。

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开始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里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采取了“合作政策”。它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利益，在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的侵略目的。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清政府亦强烈的感觉到“彼族深阴狡黠，遇事矫执，或条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伸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然而，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只能是卑躬屈膝，对外一味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在这种所谓的“中外和好”的“和局”面前，经历了绞杀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的高官大吏，诸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亲眼看到了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的“长技”，从而预感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1860 年《北京条约》签署后，曾国藩就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 年 3 月，曾国藩又再次强调购买外洋船炮乃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进而主张应“广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之，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存远略。”而李鸿章则更因在 1862 年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与英法侵略军和华尔的“常胜军”向太平军进攻时亲眼看到外国军队的“落地开花炸弹”而赞不绝口。初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应当说，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正如后来的学者在分析中所认为的那样：“李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

第一 李鸿章在同

◀ ◻ ▶ ◀ ◻ ▶ ◀ ≡ ▶ ◀ ≡ ▶ ≡ | ≡ ↺ 🔍 ↻

参考文献

Dewey. Art as Experience[J]. 高等教育出版社, 11.4(2022):1-4. Title of the first reference. *Journal Name*, *Volume*(*Issue*), *PageRange*.

Plato. Utopia[M]. 高等教育出版社, 01(2333):-2-4. Title of the second reference. *Another Journal*, *Volume*(*Issue*), *PageRange*.

感谢聆听!